

政协文史资料

(第六期)

政协蓬溪县委员会文史组编

1986年2月18日

目 录

(一)、蚕桑专家陈孟侠

.....詹天琼 范福安 (1)

(二)、回忆段虚谷先生

.....庄济华 (2)

(三)、实业家王武林先生传略

.....李朝德 (6)

(四)、白谓言同志在剿匪中牺牲的始末

.....胡延新 (8)

(五)、“大足馆”与妇女放足运动

.....陈宪卿 (10)

蚕桑专家陈孟侠

詹天琼 范福安

陈孟侠字良贵,又名陈当根,是蓬溪县鱼泉乡二村八社水井湾(现县农机厂厂址)人。生于清同治十二年(公元一八七三年),弟兄五人,他居长。二弟陈良福字焕堂,是位治马的医师;三弟陈良善(孙女陈学静现赤城镇下河小学任教);四弟陈裕阶(其子陈其才在蓬溪县养路段工作,现已退休);五弟陈宝颐,早年迁往大石桥乡居住。陈孟侠之孙陈丙云从建国后就将祖业遗留的桑树从事养蚕,后又随土地入合作社,直到八十年代初期还在采集桑叶饲蚕。重孙陈伯雍、陈伯清等四弟兄都能自食其力,从事农、副业生产,现迁移在县城水井湾新市场后山居住。

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29岁的陈孟侠,蓬溪士绅称他为“吾蓬有志之士”,便贖金各学费送往合川县大河坝举人张森楷创办的蚕桑公社肄业,学习改良蚕桑新法,张森楷见陈孟侠诚挚谦逊,将他嗣为社长。继后,张森楷拔识是同窗之楷模,使用该公社经费于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送陈孟侠去日本肄业蚕桑三年,期满于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回国,随即回县。

陈孟侠回县后(宣统二年到三年的时间里),由于在日本肄业时深受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影响,他在家乡的蓬溪县城,宣传剪辮子、留短发,不缠小脚等,他同南充张渊先生(建国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是好友,也有交往。他一面在家栽桑养蚕,一面动员社会力量和群众栽桑养蚕,以植艺的合种桑(从合川县大河坝引进的湖桑良种,经嫁接后的桑苗,当时称合种桑),首先带头把自家的土地上采用高秆稀栽的办法,将全部旱地间种桑树三、四千株,余作推广,低价卖给农民,出售甚广,畅销县属文井、常乐、下东、城厢及射洪县属洋溪、青杠等地,所栽的树十万株,均称获利,深受广大蚕农赞扬。同时,又以自己作出的示范,动员社会力量把县城的白蜡寺、先农坛、南坛、北坛、三圣宫、白塔寺外之西较场(现林业局内农场属柚子园)等一切会业隙地都栽满了桑树,明月高洞庙会业地180余亩也都间种了桑树(后由士绅刘子清租给谬天刚开办私营蚕种场)。据《蓬溪县近志》卷七之八记载:“县有湖桑始自清宣统年间”,也正出于此。陈孟侠从外地引进了良桑种,亲自栽培并动员社会力量栽桑养蚕,这对蓬溪蚕桑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同时,他又引进了改良蚕种,春、秋季他在家指导养蚕并制造二十八蛾圈的框制改良蚕种,制好后挂在凉爽的墙壁上,来年春天又低价卖给蚕农饲养,他对改良蚕种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他制种用的蚕具如切桑刀、制种蛾圈等都是从日本带回来的。他带回的三把切桑刀,长约一市尺、一市尺五寸、二市尺不等,刀片薄而锋利,保存至今,他孙子陈丙云养蚕切桑均用此刀,他所栽湖桑,一九五四年

以后，还在采叶饲蚕。

民国元年至八年（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九年）陈孟侠出任广安县实业局长，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他父亲陈运亨病逝，陈孟侠回家办理丧事后又去广安。民国九年（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三年）调南充县任实业局长，并兼任南充德合丝厂（现省属第三缫丝厂）要职。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调任蓬溪县实业局长，谢友三（县粮食局谢之固之父）任技士；他任职后把先农坛、白蟾寺、西较场、三圣宫、南、北坛等一切会业隙地所栽桑树全部划属实业局管理，桑树长势喜人，产的桑叶低价卖给蚕农饲蚕，至今，蓬溪知情的老人都称赞他是“蚕桑专家，实干家，给群众做了一些好事。”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以后，军阀混战，县城驻兵一团，无广大操场，遂将白塔寺外西较场桑树数千株，全部挖去，平作操场；加之蚕丝销路不畅，农村也大砍桑树，养蚕之事微矣，实业蚕桑遂告搁寝。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陈孟侠任贫民工厂厂长，厂址设龙王庙和土主庙（原蚕桑局旧址、现糖业公司内），招收贫民，以织布、缝衣、打草鞋、编蒸笼等为职业，引导青年贫民走自食其力之路。陈孟侠病逝于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终年五十五岁。

陈孟侠还热爱社会公益事业，他在蓬溪任职时喜欢种植花草，他还经营和指导公园（现县政府内西侧）繁殖花草。

陈孟侠热爱蚕桑事业，既实干又宣传蚕桑事业，可称名符其实的蚕桑专家，他从外地引进了湖桑良桑品种和改良蚕种，于国于民都有好处，他热爱事业的精神，钻研事业的干劲，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师。

回忆段虚谷先生

庄 济 华

先说几句

段虚谷先生对我可说是忘年之交的诤友。他的大儿子还长我一岁，他却仍以表兄弟之情相待。正是这样，我青少年时代成为他家的常客，确使我受他教益不浅。

关于记述他的生平，我在雅安和段大块谈过，在成都也同段二文谈过，他们都认为有些碍难：一是觉得了解不够全面，二是着笔分寸上尚不成熟。研讨结果，我认为只好采取“百衲本”形式的办法，能了解的人都回忆记述一下，然后综合形成较完整的资料。

我能回忆到的，是和段先生相处听他讲的一些，有些又是从老一代前辈人那里听来的。由于事隔多年，挂一漏万之处定会不少，比如说他的生卒年月我就尚未弄得清楚，以

及他的经历事迹在顺序上更不太准确。这些不足尚望知情人补正才行。

孝友家风 一直保持

段先生本名段益怀，虚谷是他的号名。取“虚怀若谷”之意。他父亲去世很早，由他那慈祥、精干的母亲培养成人。

他母亲谢××我们晚辈都称“三姨”，是一位治家严、待人宽的老人。段先生对她非常孝敬。他们这家人堪称长幼有序、孝友家风的典范，到现在的下一代人，我接触到的都保持着彬彬有礼、和善好客的传统。

我在幼年时是个调皮捣蛋的顽童，爱爬房吊树去取鸟巢，或者约一伙小鬼翻桌子“接灵官”作耍，如此初到段家是不受三姨欢迎的，但我多次去过以后，她并不认为我是那么“野性”，而是由于生母早逝形成的变态心理，玩世不恭，由于她慈祥的启迪，我逐渐在段家的气氛熏陶下不再胡闹了。

兄弟间的礼让、和睦、友善，遇事有商量，我看现在段大块、二文以下弟兄这些人还是如此，是段先生言传身教的结果。“孝友家风”对段先生全家来说，不是像有些人那样挂在堂屋里的格言，而是实在的行动准则，人人皆知的美德。

上海求学 历尽艰辛

我仅知道段先生是同李凡丞、李才良一道去上海求学。在此以前进过“潼属联中”，即原三台省中的前身。在上海是进的“上海艺术大学”。据说当时校长更换很频繁，仅知现在还健在的刘海粟老先生作过那里的校长。

由于当时还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加上军阀混战时起时伏，能够长途跋涉到达长江的尽头，已不是易事了。据段先生描述当时的生活情景是在极端动荡中度过的。那正是二十年代的上海，国内外各种势力都在活动，眼花缭乱的政局，稍不小心就飞来横祸；异奇古怪的社会，稍不注意就会跌下陷阱。

段先生讲起过一位“四川老乡”，是万县或梁平的“莘莘学子”被骗丢命的故事，这位学士到上海进的某大学，与一位邻居的“小姐”情投意合，结婚时“娘家”还陪嫁了四位美丽的丫头，又给保了“人寿险”，不到一年这学士就纵欲而亡，事后巡捕房通知了四川同乡会，说是一个“折白集团”设的骗局，用他的命提走了一万元保险金。总之，除了紧张学习而外，还要用不少注意力去应付生活的安排、环境的适应等等，艰辛之况不难想像了。

艺林奇闻 妙不可言

段先生在沪时期，可也收获不少，他也乐于谈论这些令人大开眼界的珍闻奇事。涉及面广，接触人多，这里略举一二有趣的人和事。

有位华林教授在艺大任教，是老独身主义者，此人生活很散漫：穿衣服是每月买置

一身，来一个彻底“新陈代谢、去故纳新”，形成上半月清洁整齐，下半月肮脏不堪。

还有位辜洪铭教授，原在北京大学教书，是拉丁文专家，也到过艺大讲学。此人最奇怪，教西文不说洋话，有个洋人公使去拜访他，他只讲汉语，洋人请他用法语对话，他火了，改用古拉丁语讲话，那洋人不懂，被他派骂一场，说是“我尚未忘祖宗的话，你却忘了你祖宗的话，‘可耻’！辜教授还有个怪癖气就是每写文章时必有足臭鼻吸才能文思涌来，受“臭”气启发方可写出文章。

被当时“誉”为“屁股文人”的张静生，原在艺大教书，由于发表出版了他写的《性史》一书后，女同学拒绝听他讲课，他一再申明他在教坛上决不讲性史，仍无济于事，只好辞职离开了学校。

从此可以看出，那时的上海滩文化界确是五花八门的，下里巴人多于阳春白雪；张资平的三角多角恋爱，黎锦辉的靡靡之音如“桃花江”之类。在这样的花花世界，段先生能处污泥而不染，确非易事！

据我知道，段先生当时对《世界语》的传播是个积极分子，四十年代他曾给我不少这方面的书刊。他还是“绿星社”的会员（世界语学会组织）。当时他与丰子恺先生来往较多，通过《语言学》刊物，他同周树人（即鲁迅）、林语堂也有来往。他与当时编《艺术生活》的钟山隐虽是四川同乡（钟是三台人），但来往不多，只推荐过宝梵寺壁画照片给钟先生在刊物上发表。据段先生讲，《艺术生活》是四川军阀范绍增捐款办的，他避免同这些人打深的交道。

长教“东方” 增育人才

段先生回川后在蓬溪初中教过书。随后就去成都作东方美术专科学校的校长。在长教期间，很受当时“五老七贤”如徐子修、卢子鹤、张表方等人的赏识。据他讲，他办学顺利有两条博得大家欢喜：一是采用蔡元培先生办北京大学那套“兼容并蓄”的办学方针；一是国画为主、西画写生奠基。据他讲，当时成都的社会条件，如果硬搬上海艺大那些人物写生，作“模特儿”素描之类，肯定会遭反对而下不来台，后果更不堪设想。

有位张百农先生，段先生很赞誉，是一位科技、工艺美术的通才多面手，堪称难得的人物。在东方美专搞了不少改革、创造，闻名川内的方木匠所制小提琴，精密天秤等就是张百农先生亲自指导的成果。我与张百农先生只见过两次面，发现他确是古今中外、琴棋书画、精工技巧，骑马打气枪，从锻工到电工无所不精的。但张先生有个专业癖，话不对路根本不理睬你，往往使造访者尴尬不堪。奇怪是只要持有段先生的名片或便笺的人，他却会热情接待。

段先生在东方美专招收了女学生，在当时是开先例的。为此招来不少非难，尤其是男女合班上课，遭人攻击最为厉害，那些造谣中伤的流言蜚语，连他的表兄谢志诚也半信半疑，回来说给他三姨（即段的母亲）知道，引起一场风波，经核实属于“误传”后才没有闹成纠纷。

“勤奋治学、先博后精”是段先生倡导和身体力行的。他办东方美专时，经费开支以书刊教仪为主，据说住房校具却并不讲究。他家私人藏书也极为丰富，报刊《如东方杂志》、《新青年》等等，大都齐备。因此段先生的知识面是很广的。他也鼓励我们在青年时代多学广学，中年以后才考虑精专，否则是溪流小沟，见识有限。他在东方美专时就带头复习英语，学习世界语，他还懂一些法语。四十年代他在家里养病，身边还随带《辞源》与《综合英汉辞典》，时或翻阅查对。他认为中西文对照，对语言逻辑、文章体例有很大的益处。他对我不止讲一次，说他最遗憾的是未学好数学，限制了很多学术领域的开拓。

投笔从戎 转战湘鄂

他，是去江安省中教书在前，抑或到抗日前线在前的顺序我还不太清楚。仅知道他投笔从戎是当时郭沫若在重庆时领导下那“第三厅”号召并组织的文化人到战地工作，而参加前去湖北、湖南两个某些战区的。

关于转战湘鄂作文化服务的详细情况不甚了解。我看过他们合编的一些印刷品，大都描写抗日的将士生活情况。记得有一本画册是爱国将领张治中先生题的封面，内容却很特殊，既有国民党军队的抗战生活图片，也有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生活图片。

尊师重道 敬业乐群

四十年代段先生回县后，就没有再外出了。除任民众教育馆长外，有一年多在家养病，其余时就在家读书或作画，参加一些他认为厌烦的交际应酬活动。

说到尊师重道，段先生最讲究。我介绍唐昌源、夏齐树去他那里拜门学画，他欣然同意，但一定要坚持“行跪拜古礼”。先是我以为不然，说未免那样，何必如此。他认为这不是苛求，他在上海去张善子、张大千那里去“参师”还不是“拜门”也行礼如仪的。最后仍然依了他，才收下了这两个弟子。听段先生讲，尊师爱徒、父慈子孝是中国传统美德，“行礼如仪”还不过是对真诚心思的一种考验。总之，他对那些向老师打翻天印的人是异常反感的，说是涉及个人品质的评价问题。

再说到敬业乐群，段先生很有开拓精神。很有益的新鲜事，属于首创之项当年都有段先生带头：养约克猪、来航鸡、意大利蜜蜂、办长毛兔场（当时称安哥拉兔）、制足踏升水机、手压喷水器等。养长毛兔当时说非要用“阿尔法法”草不可，有些书又说叫“俄利瓦瓦”，他托我查查是什么草，由于是音译，费了很大气力才知是“ALFALFA”，就是“苜蓿”，他不惜用重金去西北买了种籽回来试种。

他家藏有不少有关工艺的书籍，如最早的《化学工艺制造大全》，他按法试验。有时找我去帮他搞试验，杨达三先生、何宜生先生也被约去给他作指导。那时主要是搞精盐提纯和卤水利用。

对制印泥和国画颜料，段先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对这方面的工艺技巧钻研很精。

我帮过他制印泥，那春捣“艾绒”的手工劳动，对成品要求非常严格。有些国画颜料要进行“水飞”、“火煅”，大有炼丹的味道。这样复杂，但段先生却兴趣浓厚，都是要亲自动手的。

段先生精于刻印，说是“非石不雕，劣石不雕”。他认为最见功夫的是印章的“敲边”与“刻款”，当时能像他那样刻的还只有大块与二文。后来说是向烈炎为了要学这门手艺，曾拜门求教，但运刀总有些匠意，不够自然。

胸襟开阔 幽默稳重

段虚谷先生这人非常乐观。曾画了幅条形山水，裱好后送我，题诗我只能记起后两句，“连天水云空旷处，好约轻舟荡五湖”。他一直认为，中国诗画没有开阔的胸襟，是不会有好作品的，因为思想境界狭窄，画出的山就像乱葬山的坟堆，水就像流源不远的小便。可见段先生是很富幽默感的。

段先生爱讲笑话，大家在捧腹时他仍不笑，慢条斯理的讲他的。他认为生活上应当是活泼而不轻浮，严肃而不古板，热情而不狂燥。他还认为要“居之安”才会适应环境，常对我讲，个人饮食起居要做到“吃粗食不便秘，吃油大不拉稀”就好了。所以他的生活是多样化的，决不单调：他会舞剑，弹七弦琴，吹奏洞箫，骑跑马，打气枪（他不欢喜震耳的鸣火枪）等等。

我很佩服他的记忆力。他能将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国内各派文人的论战文章说出要点，突出的还能指出刊于何处。记得有位名流为自己的作品写了篇序，他交我看，说是那序文是抄古人的，叫我找出对一对，我费了不少气力未翻到，他才说“××诗文素不求人作序，求之显宦有近阿谀，求之闻人有失汕笑”这几句，不正是清朝郑板桥某篇序文的“袭句”吗。我来一查，“王公大臣”改成了“显宦”，“湖海名流”改成了“闻人”。由此足见段先生治学的留心程度与强记功夫，也说明他一丝不苟的稳重，实事求是的处世精神了。

一九八五年七月七日

实业家王武林先生传略

李朝德

王武林，男，汉族，世居蓬溪县上东乡响滩子（现赤城镇二村），生于一九〇三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夏历八月十四日，卒于一九七二年十二月，终年七十岁。祖、父皆务农兼营盐业，家资较丰，童年启蒙，诵读儒书，敏而好学，及长，南充旧制中学毕业，一九二四年考入北平朝阳大学肄业。越明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继入“学联”，选为

组织部长，曾出席在俄国使馆召开的“学联会”。“四一二”政变后，神州大地阴云密布，血雨腥风，北洋军阀绞杀共产党人和迫害革命知识分子，并通缉进步青年，先生名在其列，被迫辍学，取道汉口返回故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隐蔽教育界，任职县中教员。一九三〇年春，时值介绍入党之杨廷杰掌县教育局长，授老一区视学职。同年下期，经人告发于边防军总部，李家钰派武弁拘捕及同党戴明德、苏俊等八人下狱，嗣经县中校长李青芝先生设法营救获释。自此，离开党务，投身国民党政界，一度权蓬莱镇长；一九三七年应同窗巫山县县长冯子君邀，与段虚谷、冯楚天等为其幕僚，执教科长年余；同样，励志经营盐业，举为盐场评议长，供职十年，对振兴本县盐业生产，活跃地方经济，具有一定贡献。

本县盐业，历史悠久，有利国计民生，其兴衰起落，与地方经济盈虚攸关。尤制盐过程，向来工具粗陋，若煎盐原使泥灶，月煎一次，必打炉（撒毁）再造；且卤水咸度低，水分重，杂质多，出盐质差费高，不易销售，常有灶户亏本，负债，破产者，时临倒闭之虞。基于此际，先生颇关注劳形，锐意革新，一九四二年秋，会同其弟王武和，侄王定志商讨决定，将已经营的上东乡响滩子灶和太平灶煎盐泥炉改作石灶，制定方案，报经川北盐务管理局支持，派工程师协助，半年告成，由三锅煎致九锅，锅底长由三锅易一锅半。虽收到省燃料多出盐，不打炉上灶，减时省工的显效，但产盐色泽不洁，呈泥色难予出卖，工程师束手无策，专函天津黄海食盐公司，亦无法解决此一技术问题。先生与侄定志探讨其中学问，发现卤水所含泥、沙、石、灰元素，过滤不清缘故，再分析选择滤物，试以茅草灰，具小块粒状多特点，又是烧盐主要燃料，可就地取材，优于其它滤物。其间，观摩者络绎不绝，经反复试验比较，澄清了卤水，终于烧出了洁白晶莹之花盐，易于销售。然卤水咸度不高，一般仅七、八度上下，仍耗燃料，次年，先生首先学习三台、射洪等县推广枝条架蒸发水分办法，用斑竹枝千余斤，在当风高处搭棚修坝，再以吸筒把卤水抽至棚顶竹筒内，竹筒两边凿无数小孔，让卤水由孔渗出，顺枝条缓慢下滴，经风吹日晒，使淡水蒸发；卤水咸度提高二十至三十度，再经石炉流水作业，浓度更高，则燃料大减，成本大幅度降低。上述二者革新成功，及枝条架晒水经验，由此迅速普及全县各盐灶推行，使频于倒闭、衰颓的蓬溪制盐业又获生机。

本县所产花盐，除人民食用外，必大量外销，常存滞销状，先生不辞辛劳，去重庆国民政府财政部或三台盐务管理局请愿，四处奔走，勾通销路；在运输方面，从来靠力夫挑运，负重劳累，跋涉艰难，若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先生因势利导，约同杨达三、冯楚天、岳明升等社会贤达，合资办办“后生车行”、“和生车行”辅以板车、牛骡拉运；然每至旺季，仍堆积待运，亦不能适应盐业兴盛之势，则再与股东冯楚天集金买回汽车两部运输，似此，不仅克服了滞销局面，而且销地遍及南充、岳池、武胜、广安等县城乡市场，与自贡大盐比美。当汽车能源紧张、汽油、柴油靠进口，不易购买时，先生目睹本县所产高粱烧酒大量屯积待销，即与王伯阳、周奇科、庞建秋等人商榷，合资建起第一座塔式蒸馏酒精厂，炼出浓度达九十以上的酒精，供给汽车燃料，运输畅通，使花盐滞销僵局得以复苏。

蓬溪，地瘠民苦，抗战时期，商贸萧条，经济落后，中等教育事业发展迟缓，先生

不忍坐视，一九四〇年与乡士罗绍遯筹资开办第一家公私合股的县银行，首任经理、董事长职；同时会同地方士绅集资兴办抗建、常光两所私立中学，推选作校董。为活跃社会经济，扶助清贫学生升学，为地方培植人才，亦建功立业，闾里咸知。

新中国建立初，先生曾任县人民政府建设科长、成渝铁路川北民工指挥部秘书、铁道部二工程处广元供应站长、成都铁路局供应科主任计划员等职，为党和政府所器重，在“左”的路线下，一九五七年免职下放回乡，曾参加各界人士学委会学习，十年浩劫中含愤以终。

白谓言同志在剿匪中牺牲的始末

胡 延 新

白谓言同志，山东人，系二野61军181师炮兵营重炮连指导员。随刘邓大军完成了解放大西南的任务后，于一九五〇年初，和炮连张连长率领18名解放军战士奉命执行配合地方征粮工作队征粮、剿匪建立和巩固地方政权的任务。

当时的隆盛乡，张漆两股反动势力和当地土匪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明里暗地进行着反对共产党反对解放军和为害人民的罪恶勾当。在反动势力的暗中纵容下，家住隆盛乡（现属金竹乡）属芦林沟的惯匪邓正三，伙同杨子堂（绰号杨八娃，射洪大明乡人，土改时被我镇压）、苏明贞（射洪柳树乡人）等多人盘踞芦林沟，出没于隆盛、民主、鄆口、回马以及射洪大明一带，抢劫民财、危害人命，破坏征粮工作。当地人民恨之入骨。

白谓言同志和张连长率领的解放军战士就分配在隆盛，配合地方工作队，担负着隆盛、回马、民主、鄆口以及金元、钱家一带的征粮剿匪工作。

三月二十日早饭后，工作队一分为二，由白谓言同志带领七名解放军战士配合三名地方工作人员，由隆盛开赴鄆口执行任务，另一半同志留守隆盛。

大约九时许，白谓言同志一行行至老观滩过河的飞钟寺时，突见由芦林沟方向一农民打扮的壮年人一路小跑奔工作队而来，临近时边跑边喊：“解放军同志，工作队同志请等一下”，白谓言同志见有群众找来，立即停止前进，待来人走近时便问：“老乡，啥事！”来人气急败坏地说：“那边有几个棒客（即土匪）正在开会，请你们快去抓！”同时反手指着芦林沟方向。白谓言同志追问：“在哪里？有多少人？”来人说：“在芦林沟邓正三家里，只有三四个人。”白谓言同志当即命令全体同志立即出发，并叫来人前面带路。当时有一解放军战士建议：“派一名同志转回隆盛通知张连长带领另一部分同志从隆盛直扑芦林沟，两面包抄，可以一网打尽。”白谓言同志阻止说：“来不及了，几个毛毛土匪还解决不了？出发”。抽出腰间二十响驳壳手枪前面走了，于是一行人以急行军

的步伐奔往芦林沟。大约十时许，队伍到达芦林沟口时，由于不识路径，不知该走那条路，找报信的老乡，才发觉这个报信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已经不知去向了，队伍暂时停止前进，想找个老乡问路，正在这时见有一位年约五十开外的老头牵了一条水牛走大田边迎面而来，相距大约十来公尺，白谓言同志当即讯问：“老乡，邓正三在哪住”？老头不知是真的听力不佳还是因为听不懂白谓言同志的山东口音或者另有其它原因，用手遮在耳后大声反问道：“啊！你说啥呀！”白谓言同志当即叫地方工作队的胡延裕再问。胡大声问道：“问你邓正三在哪里坐？”“啊！找邓正三啦？就在对门，顺大田坎过去，嘴嘴上就是。”边说边牵牛走了。白谓言同志率领一行十人，立即以临战姿态小跑前进。

大田坎的尽头，一座不大的一正一横的草房院落，这就是土匪邓正三和两户农民邓正清、邓德方的家。草房前面有一块约三四十公尺的院坝，坝边疏疏落落有几笼竹子和一些小杂树，坝外约低于院坝一公尺左右是一块种红苕地。

当白谓言同志带领全体人员刚奔至坝边尚未形成包围圈时，突然，“叭”的一声枪响，从草房内射出了第一颗子弹，白谓言同志当即命令：“卧倒，散开”！全体人员都分散在种红苕地内以高出苕土的院坝坎作掩护，与屋内土匪形成对峙。这时屋内土匪不断射击。我工作队系全副武装，武器装备有一挺轻机枪，两支手枪，一支美式冲锋枪，六支中正式步枪和部份手榴弹。为了防止土匪冲出逃跑，当即对土匪给予猛烈还击。一阵紧张的对射以后，工作队立即组织喊话：“缴枪不杀，投诚自首给予出路”！每次喊话以后，土匪就是一阵猛烈的射击，土匪凭借檐下一口装满水的大石水缸和土墙掩护的有利地形和雄厚的火力，射击越来越猛，间或还扔出一两枚手榴弹，丝毫没有投诚的意向，坚持顽抗到底。鉴于这种情况，工作队只有加强火力，双方越打越猛。战斗约半小时后，工作队的胡延裕同志，由于缺乏实践经验，掩护不好，在躬身转移位置时，右后背被土匪子弹射中，形成长约十公分的擦伤，血流不止，又无法撤离，但又不能参加战斗，指导员见其负伤，叫他顺沟爬到机枪旁边帮助射手压机枪子弹（工作队在鄆口一户破落地主家中收缴到数千发79步枪子弹，因此在执行任务时每人随身携带的都上百发，而这种子弹与旧式机枪子弹同型号，可以通用），在激烈的对射中，机枪因连续射击过久，枪管发红，突然卡壳而哑火，白谓言同志立即指挥步枪手枪，封锁出口，同时命令携美式冲锋枪的战士刘××顺右边檐下迂回接近大门消灭敌人，老刘抽出手榴弹奋身一跃上了院坝，刚越过第一笼竹子在跃往阶沿的过程中，不幸被土匪手枪击中小腹，倒在竹林边。这位身经百战的指导员白谓言同志眼见在几个土匪面前连伤两位战友，更是按捺不住满腔怒火，命令集中火力加强封锁，迅速在二十响的快慢机上插上新梭子，勇身一跃，一边射击，一边跳跃，以飞快速度越过三笼竹子，跃上正房阶沿，眼看将接近大门，却被土匪击中腹部，倒了下去。战士们见连伤两位战友，指导员又负重伤，无不万分愤怒，顿时以更大火力，想一举消灭敌人，土匪也加紧了射击，于是枪声更加紧密，手榴弹一来一往也更频繁。

当时由于时处春末，天气又比较亢阳，堆放在房檐下的豌豆藤被手榴弹爆炸引燃，草房也随即起火，整座草房笼罩在浓烟烈火中。大石水缸也被打烂。这时土匪眼见将无

藏身之地，随即连续扔出几个手榴弹，趁着浓烟掩护，四个匪徒每人手提双枪以很快速度跃出房门越过房侧上了山梁向射洪馭子垭方向逃窜，土匪在逃跑中被解放军战士将最后一名左臂击伤。由于工作队有三名伤员必须立即抢救，加之道路不熟，土匪去向不明，未便组织追击。

土匪逃窜之后，同志们立即将负伤的三位同志送往遂宁抢救，但因白指导员伤势很重，失血过多，在送到距遂宁还有二十华里的石溪壕时停止了呼吸，不幸牲牺，另两位同志经医院抢救得治。

匪首邓正三当时不在家，已往隆盛赶场，知情后即日逃往江油窦圉山，潜藏于同乡苏洪太家，次年土改时被抓获归案，在康家渡依法镇压。

“大足馆”与妇女放足运动

陈宪卿

过去，稍大一点的商店，都要根据行业的性质、特点取个名称，做块招牌，挂在门上，以便招徕顾客。后来，商店的名称和招牌的制作、书写都日趋艺术化。在蓬溪县城就有富于诗意的“洞庭春”茶馆，有根据业务的实际情况命名“吉祥馆”食店，还有表示闲情逸致的“杏花村”、“不醉归”、“邀明月”等等酒楼、酒店。招牌有嵌边的、有绘图的、有贴金的；有草书的，有隶书的，有楷书的，无论内容和形式，可算丰富多采。可是，清代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正月初一日，挂在薛毓伦面馆门上的招牌却与众不同。当天上午，十点钟左右，由衙门领班领着乐队，抬着招牌，吹吹打打地从县衙门内走出来，在一阵激烈的鞭炮声、欢呼声中，将这块由蓬溪县知事杨开运亲自命名、亲笔楷书的“大足馆”三个大字的招牌悬挂在衙门口薛毓伦面馆门上。

薛毓伦面馆桌凳整齐，四壁粉得雪白，整个堂口收拾得干干净净，薛的妻子杨氏破例地出来跑堂，她那双约六市寸长的从不敢见人的条形大足；今天也从柜台里、板凳脚后面（过去妇女脚大坐板凳经常靠在板凳脚后面，不敢让别人看见，认为足大是极耻辱的事）出来和众人见面了。她大大方方，灵灵便便地跑堂。由于“大足馆”招牌异乎寻常的出现，吸引着成群的人们到店门前来参观。从此，“大足馆”的名称，便传扬开去，杨知事为啥那么重视大足呢？这是政治上的需要。

戊戌政变后，操纵清王朝内外大权的慈禧太后，企图恢复旧制。但是，由于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运动，在海内外都得到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对清王朝统治者威胁很大，因此，她对变法态度采取了缓和的政策。地方基层官吏没见新的旨意，也只好沿着变法规定执行。光绪30年（公元1904年）蓬溪县建立了高等小学堂（在今县中校），废除书院制，同时，为革除妇女缠足旧俗制造舆论。光绪34年的春节期间，在中河街的巨绅家门上，贴出公开反对的对联：“变法除旧俗，问你妈那天放足；高等讲新章，看我儿何日

出头。”横额，“奇哉怪哉。”

蓬溪县知事杨开运，目睹这种现象，胸有成竹的逐步掀起放足运动，首先亲自编撰了一百韵《大足歌》（笔者于1934年在下东乡李东山家的旧帐簿堆里发现过的），印刷成小册子，散发给街乡进行宣传，还张贴告示晓谕人民知道放足的好处。仿令孤老院能够演唱连花落、金线桥的叫化子到城乡演唱，还决定在县城建立“大足会”，发出告示扩大影响。为了打开放足局面，杨知事亲到大街小巷，进行调查，选择有胆有识的大足妇女作典型，经过半年多的了解和考查，终于发现了薛杨氏这一个大足妇女的典型人物。

薛杨氏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由于家庭贫寒，其母靠出卖劳动力盘家养口，长年累月忙于劳动，对女儿的缠足问题，不大十分注意，薛杨氏幼小时也经常和妈妈缠足，可是，只等妈妈上坡劳动，她就立即解放，或白天缠足晚上放，结果足未缠小，反而成了六寸长的一双大足。

正月十五日上午，蓬溪县城厢团保办事处（今公安局处），张灯结彩，庆祝“大足会”的成立，经过“大足会”批准的三、四名大足妇女吸收为成员，杨知事当着城厢、上东、下东、南路、西路、北路等团总的面，宣布了城厢建立了“大足会”薛杨氏担任会长，前来参加大足会的妇女，都属于大足会成员，并告谕各路团总，从宣布之日起，各路重大事情必须有大会会长参与其事，有权处理当时事宜，旁人不得阻拦干涉，如有不让大足会成员参加，除不承认事实的解决外，还要受到处分……的规定。另外，强调各路团保，要协助组织成立“大足会”，提倡放足。

团保处里，突然一阵鞭炮声，大足会长薛杨氏带领着大足会会员，在杨知事的带引下，退出会场回衙门去了。她们也一反常态，昂首阔步走在北街上，两旁的人们都投以亲切的眼光，一些小足妇女，低下头来，看看自己的小足，只好“望足兴叹”啊！从此，开辟了蓬溪放足的道路。

大足会长薛杨氏，是一个杰出的妇女，不但勤持家务和经营面食业，还秉公执正协助团保处理社会上的各种纠纷，特别是有关妇女纠纷的事件，解决得合情合理，既不袒护妇女，也不压制对方，如有仗势欺凌妇女的事件发生，她挺身而出为妇女撑腰评理，附城的乡村发生了事件，她也亲到解决，不怕跋涉劳苦。因此，声誉大著，一般人都称她“薛大足”，一直到新中国建立她都享有盛誉。